西 班 牙 史 纲

1808—1917年

上 册

〔苏〕伊·莫·马依斯基著

北 京 编 译 社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言 …… *1—4*

1808 年前夕的西班牙……1—64

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1

政治关系……26

拿破仑与波旁王朝(1808 年)……65—81

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和第一次革命

(1808—1814 年)……82—148

前线……82

后方 ……111

反革命(1814—1820 年) ……149—176

第二次革命(1820—1823 年)……177—285

西班牙阶级斗争的形式 ……177

里埃哥起义 ……184

革命的三年 ……208

神圣同盟的干涉 ……248

黑暗的十年(1823—1833 年)……286—313

China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和第三次革命
(1833—1843 年) ……314—385
战争的社会根源 ……314
军事行动 ……325
政治斗争 ……339
埃斯帕特罗的独裁 ……372
纳尔瓦艾斯将军的独裁(1843—
1854 年) ……386—405
十九世纪中期的西班牙经济 ……406—422
第四次革命(1854—1856 年)……423—449
政治浮沉：奥当奈尔——纳尔瓦艾斯
(1856—1868 年) ……450—474
第五次革命(1868—1874 年)……475—538
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 ……475
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度的探索 ……495
第一个共和国 ……509
第二次卡洛斯战争(1873—1876 年) ……539—552
普鲁士道路的西班牙翻版(1874—
1898 年) ……553—633
普鲁士道路的起源 ……553
康诺瓦斯和萨加斯塔 ……570

China

虚伪的代议制机器 ……581
复辟时期的内政 ……609
工农运动 ……621
帝国主义时代和复辟时期的对外政策 ……634—652
复辟制度的崩溃(1898—1917 年) ……653—735
“1898 年一代” ……653
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发展 ……664
统治集团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684
工农运动的发展 ……695
旧政党的瓦解 ……710
结论 ……736—754
资料和文献 ……755—778
人名索引 ……779—829
地名索引 ……830—849

China

1808年前夕的西班牙

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西班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国内保存有浓厚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残余，天主教会的势力极为强大，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比较脆弱。

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封建类型的大地主，他们是国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至高无上的主人。这一点，在西班牙的土地面积分配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十九世纪初期，土地的分配情况如下①：

	绝对数字（百万公顷）	%
地主占有……	18.3	51
教会占有……	5.9	17
农民占有……	11.4	32

① C. E. Chapman, A history of Spain, New York, 1927, p.464.（斯·伊·查普曼：《西班牙史》，1927年纽约版，第464页。）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见，半数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统治阶级和国内最大的地主——教会一起，直接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十八。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保证而且确实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由浓厚的中世纪封建残余产生的许多别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大土地占有制的统治。

这些因素中，十四——十五世纪产生的长子继承制度占据首位。根据这一制度，父亲遗留的地产不得分散或出卖，只能由长子继承。属于地主、教会和农民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变成这种“死手的地产”。这当然会使大地产保持原有地位，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长子继承制度的存在，必然引起租佃制度的广泛发展，从而形成一条新的锁链，把农民捆在大封建主的车轮上。据十八世纪末期的统计数字，约有九十万农户（即达五百万人）是租佃别人土地的①。这就是说，至少有半数的农民（当时西

① A. Ramos Oliveir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en of modern Spain, 1808—1946. London, 1946, p. 21.（阿·腊莫斯·奥利韦拉：《近代西班牙（1808—1946年）的政治、经济和人物》，1946年伦敦版，第21页。）

China

班牙的人口共为一千万——一千一百万）是佃农，他们的命运要听任地主摆布。这种依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在许多地方，租约的期限非常短（一年到三年），并且每次重新订立租约时，地主总要提高地租。这一时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加·霍韦利亚诺斯（他的名字我们以后还要不断提到）在致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的备忘录中写道：以塞维尔地区为例，地主利用为期很短的租佃制度，仅仅在 1770—1780 年的十年中，就把地租提高了一倍①。这绝不是罕有的现象。

根据十八世纪末期的同一统计资料，约有九十万农户（也达五百万人）不能靠自己的贫瘠土地糊口，被迫给大封建地主当雇农；他们在农忙季节挣得微不足道的工资，而在一年的其他时同则经常挨饿。这就是说，农民当中还有一个广大的阶层受到地主的任意宰割。

---

① G. Jovellanos. Informe de la sociedad economia de este corte al 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Castilla en el expediente de ley agraria. Madrid, 1795, p. 40.（加·霍韦利亚诺斯：《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加斯梯里亚最高王政会议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1795 年马德里版，第 40 页。）

China

最后，大地主还享有过去几个世纪保留下来的所谓“领主权”，他们有了这种权利，就以各种各样的歧视和限制象密网一样把农民紧紧束缚起来。地主享有狩猎、捕鱼、放牧牲畜和森林的优先权。磨粉、烤面包、榨葡萄酒等等也由地主垄断，农民要去办这些事，就得向“领主”缴纳相当于产品价值百分之十的费用。死掉一棵树，农民必须重新栽上一棵。农民在地主牧场（当时往往又没有别的牧场）上放牧的每一头牲畜，都必须缴付特别的费用。在出卖土地时，农民必须向地主缴纳百分之十的地价，尽管土地的所有人没有变动，而这种付款每十五年也必须再交一次。由于长子继承制度盛行，出卖土地的情形比较少，于是地主就把出租和出卖一样看待，在把自己的田地交给农民暂时使用时，收取应向他们缴纳的地租。这种制度在1808年前夕就很流行，1810年的议会中，议员罗德里盖斯·布哈蒙多报告说，当时西班牙有二万五千个村庄，四千七百个小市镇，其中一万三千多个村庄和三千多个小市镇均属于“领主”①。

农民最痛恨的组织之一，就是由地主兼牧主

组成的所谓“牧主光荣会”。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联盟，它只关心其成员的利益，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牧主会和农民之间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战争，原因是农民把土地圈起来，力图保护自己的庄稼不受牲畜践踏，而牧主则禁止农民这样做，要求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放牧牲畜。地主和牧主有政府当局的支持，几乎总是胜利者。

除了非宗教的封建制度压迫以外，还有宗教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我们刚在前面看到，十九世纪初，天主教会拥有约六百万公顷土地，这些土地是教会在过去数百年间不是作为皇室的赏赐，就是由封建家族捐送和遗赠，或由宗教裁判所没收“异教徒”的财产而得来的。许多古老的修道院都是在西班牙名门贵族的倡导下建造的，他们这样做只是在临死以前为了祈祷上帝赦免其一生的罪恶。这些带有尊贵称号的罪人，不惜巨资来“装饰”修道院，指望从这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教会的土地也是按照当时世俗领地的组织和管理

① F. Pi-y-Margall. Las grandes conmociones politicas en España, Barcelona, p. 85.（弗·皮一伊—马加尔：《西班牙巨大的政治动荡》，巴塞罗纳版，第 85 页。）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方面盛行的同样的封建原则来经营的，因此，这就给农民加上了另一层重担。此外，农民还不得不供养一大批白衣僧和黑衣僧，他们的人数，据戈多伊这样有声望的人物证实，在十八世纪末期达十八万人之多。换句话说，全国每六十二个居民当中至少有一个教士①！这一点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下列有趣的数字可以表明：1804年，教会不动产的总收入，经过适当的换算，估计为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此外，教会还向居民征收许多特种捐税，如“什一税”②、免罪证费、修筑教堂的捐款、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和朝拜圣地税，等等。教会还征收一些荒诞不经的税款，例如为十字军远征的募款，而十字军远征，如所周知，早在十三世纪就结束了！这一切额外的付款，总计约合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这样一来，教会

① Don Manuel Godoy. Memoires du prince de la paix. Paris, 1836, p. 23.（唐·曼努埃尔·戈多伊：《和平公爵回忆录》，1836年巴黎版，第23页。）其他资料也证实戈多伊的数字是可靠的。

② “什一税”是一种古老的税收。它起源于公元六世纪，征收信徒收入的十分之一归教会。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这种税特别普遍，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

China

以各种形式每年要从西班牙人民身上榨取二亿五千万金卢布，平均每个居民摊二十三个金卢布——这在当时是十分庞大的数字①。十八世纪末期，西班牙有两万多座教堂，即平均每五百人有一座教堂，这是不足为奇的。教会的高级人员沉湎在豪华的生活中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主教和大主教的薪俸每年达几十万金卢布。这就是1808年前夕天主教的情况，尽管国王查理三世在1767年就把耶稣会驱逐出西班牙，并将其财产收归国有。

不难想象，这一整座封建金字塔是多么沉重地压在广大群众的肩上，首先是压在千百万农民的肩上，他们不得不缴纳近百种不同的封建赋税，其数额要超过全国赋税重担的若干倍（有时为四十——五十倍）。因此，一贫如洗和绝对无权的地位成为农村居民自古相沿的命运。繁重的劳动，饥馑，疾病，地主的残酷剥削，主人监工的凌辱和专横，神甫关于顺从和报应的劝慰，这一些从摇篮到坟墓一直伴随着农民。农民住的是破烂的

① 参看«Воинствующий атеист», М., 1931, № 6, стр.72—88.（《战斗的无神论者》，莫斯科，1931年第6期，第72—88页。）

China

茅屋，屋门和房顶上的小窟窿，同时也就是窗户和烟筒。严重的愚昧无知、狂热的迷信、天真地忠于教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信赖国王，尊重贵族和富人的权力，是他们的政治纲领。即使在某些地方，如巴斯科尼亚、瓦伦西亚、卡塔卢尼亚的农民的状况略为好一些，但也很少改变这种情景的一般性质。农村呻吟在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桎梏下，它的内部逐渐积累起一股强大的爆炸力。

但是，不只农村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封建制度的阴森锁链也束缚了城市。行会和基尔特——这些中世纪的遗孽控制了工商业，更确切地说，是连手带脚地束缚了工商业。各居民点之间的道路处于原始状态。盗匪成群结伙地麇集在交通要道，使货物的运输极为困难。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有时荒谬已极）特别限制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并常常使物价飞腾。谁有势力，谁就可以抽捐征税，如国家、各省市，以及个别的封建主。他们从一切大众消费品，因而也是从能榨取油水的东西上抽税——如谷物、牧草、葡萄酒、橄榄油、肉类、肥皂、蜡烛、瓶子等等。西班牙立法者在这方面的创造能力，的确是无限的。特别沉重的

China

是一种古老的税收，所谓“阿尔加巴拉”（买卖税），它从十四世纪开始征收，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甚至更晚）。这就是在每一次买卖中要征收货价百分之十五的税款交纳国库。这种税实际上是这样征收的：一个农民把牛卖给收购商，于是第一次缴纳百分之十五的“阿尔加巴拉”；收购商把牛卖给肉商，于是第二次抽取百分之十五的“阿尔加巴拉”；肉商把牛肉卖给消费者，于是第三次征收百分之十五的“阿尔加巴拉”。我们所举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如果抛开食品不谈，而谈到工业品时，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阿尔加巴拉”象一盘重磨压在商业上而，竭力限制着它的发展。

只要注意到上述的一切情况，难道对商品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中价格直线上涨这一点还值得惊奇吗？上面提到的霍韦利亚诺斯的备忘录中列举了下列有趣的数字：十八世纪后半期，一“阿罗巴”① 小麦在累翁省的市场上只值五——六个雷阿耳，而把这一“阿罗巴”的小麦运

① 1“阿罗巴”＝11.15 公斤。

China

到马德里时，它的价格就涨到二十——二十四个雷阿耳。同样，一"法涅加"小麦在帕兰西亚只值六个雷阿耳，而在散坦德尔就要值二十二个雷阿耳，等等①。

当然，在上述条件下，资本主义关系仍有可能发展，实际上也在极其缓慢的发展。这种发展过程既不平衡，也不正常，而且十分曲折，常常"进一步、退两步"，但它仍然是在前进，逐渐给封建社会的内部带来一些新的成分。整个说来，西班牙是沿着西欧其他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在十八世纪所走的道路前进，不同的只是它在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从这一观点看来，查理三世的统治（1759—1788年)，即"开明专制制度"的西班牙变种，是很重要的。查理三世曾在意大利受教育，当时意大利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比西班牙进步，他即西班牙王位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有相当了解。他非常重视繁荣西班牙的经济，因此，他作过多次尝试，哪怕是稍微打开一点窗口让资本主义的

① 加·霍韦利亚诺斯：《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加斯梯里亚最高王政会议关于土地法令的备忘录》，第131—135页。

China

“时代精神”渗入到西班牙也好。查理三世最先认真地企图使西班牙经济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同梵蒂冈及其西班牙代理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查理三世是一个果敢专断的人，他不愿仰承教会的鼻息。他坚决维护王室统治的特权，他本人虽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仍然把耶稣会教徒赶出了西班牙，不过这一点，我们前面谈到，对教会在国内的地位影响不大。

查理三世把一些著名的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网罗在自己周围，他们帮助他，并且常常鼓励他推行“开明专制制度”的纲领。其中有四个人——阿朗达、康波曼内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情况，必须对他们每一个人略加评述。

彼得罗·阿朗达（1718—1799 年）是阿腊贡的大贵族，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家族，青年时代就醉心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他同伏尔泰有过私人交往，是教会的死敌，主张在西班牙实行重大的改革。阿朗达在国家官僚机构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其中包括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主席职务)期间，曾给予查理三世（尤其是在他统治时代的前

China

半期）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把耶稣会教徒逐出西班牙的事件中，阿朗达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爱慕虚荣和玩弄阴谋，过分追求法国的一切，主要在政治上不够现实等等，很快就使他在宫廷失宠，随后离职。阿朗达虽然是西班牙的著名启蒙学者之一，但在本国的社会政治史上未留下深刻的遗迹。可是，他的活动肯定地有助于资本主义因素渗入西班牙。

彼得罗·康波曼内斯（1723—1802年）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康波曼内斯是阿斯土里亚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最后爬上了查理三世的亲信顾问的职位。1763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并一直担任该职整整二十五年之久。康波曼内斯力图巩固王权，他认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是繁荣国家的经济。他是重农学派的大经济学家，他认为，只有使西班牙在经济上摆脱种种封建限制，才能使它的经济复兴。他认为，西班牙的财富来源，不应当是美洲殖民地的金矿，而应当是本国的工农业。康波曼内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政策，便利西班牙与殖民地的贸易①，他对于改善国家的财政做了许多工作，并奖励教育，促

China

进研究西班牙历史，宣传居民福利事业的重要性。康波曼内斯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官僚，他有时也搞“社会团体”，因此，他奠定了所谓“经济协会”的基础。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居民各阶层（首先是城市资产阶级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贵族及官吏）的代表人物，给予他们的优待，仅仅是准许讨论有关繁荣国家经济的问题！不必说，这个“经济协会”对于国家立法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所起的宣传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例如，下述这件有趣的事可以证明这一点：1787 年，在国王的赞同下，马德里的“经济协会”成立了一个妇女部，以公主们为首的西班牙贵族妇女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关于节俭家用和节省豪华服装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讨论，最后是达不到任何节省和节俭效果的，但是，连宫廷贵妇也感到必须参加“经济协会”做些工作这一事实，却能说明很多问题。人们常常称康波曼内斯是西班牙的杜尔阁，同时也不能否认，他们之间

① 1765 年以前，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全部贸易只通过一个港口——加迪斯来进行；1765 年，又开放九个西班牙港口来进行这种贸易。1778 年为西班牙本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而开放的港口，在西班牙有十三个，在西属美洲有二十四个。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